

全球化时代的传播与演化：浅析侨易学的知识史地位

何蓉

以叶隽《侨易学的观念》（2011）的发表为标志，建立在李石曾“侨学”与《易经》思想等知识传统基础之上的“侨易学”（Kiao-lology）得以建立。《变创与渐常：侨易学的观念》（2013）一书的出版，则是作者进一步地深化思考，完善其学科概念、核心内容和基本原则等方面，将侨易学深化为一个学科域的尝试。

在我看来，侨易学试图要容纳的，是人口迁移、文化碰撞、观念融汇、常规变迁等无时或止的社会历史现象。而在当下的全球化背景、科技手段日新月异的前提之下，人与社会本身所面对和参与的，更是前所未有之巨变，文化间交流使得加深文化的自觉成为突出的课题。基于此，侨易学理应在揭示变与不变的形态、肌理与机制等方面有所贡献。

如果集中在“文化的交流与变迁”这一主题上，侨易学便在一定程度上回到了近代以来的传播论的关注点上。传播论以文化的地理传播（diffusion）为研究对象，关注文化或文化特质从一地流传到另一地的现象，传播学派把人类文化史总结为文化的移动、接触、冲突和借用的过程（王铭

铭，1999：23），其思想对20世纪初的人类学和考古学、民族学等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影响。

不过，传播学派持有的一个基本立场令其受人诟病。即他们认为，人类的创造能力是有限的，现有的不同的民族和文化，实际上都源于一个或少数几个文化中心，各项文化物件或特质即由文化中心扩散、传播，由此，追溯特定的文化特质的传播过程，就可以确立不同人群的接触和文化的交流的历史线索。极端的传播论，如英国的史密斯等的文化单源论，将所有的人类文化的源头，都归到古埃及这一个中心。

传播论的兴起及其背后的世界观，是与近代勃兴的资本主义和殖民帝国模式相符合的，适应了处于核心地位的、文明的西方与处于边缘地位的、落后的非西方这一基本的二分法。也因此，传播学派的文化圈、跨文化传播等概念逐渐受到质疑或被摒弃不用。

但是，如果剥离传播学派对于文化源头和发展机制的种种断言，一个明确的现象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着文化实践、特质的传播与借用、演化等的事实，在全球化的条件之下尤其如此，而且，其传播的速度之迅速，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刻，演变的内容、形态之多样等，都大大超过了近代化早期的想象。

因此，近十数年间，在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学科

中出现了全球化传播（global diffusion）这样一个新的概念，认为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日常生活细节中，都存在着某些被广泛采纳的实践或习俗，因此，产生了这样一种取向来研究某些制度、观念、做法等在全世界的广泛传播。例如，为什么在人口调查中要把“民族”加进来？管制资本主义的模式是怎样在全球发展的？全球性的经济组织、非营利组织是怎么传播的？革命、社会运动等，为什么有时会在不同区域不约而同地产生？为什么全世界的新娘结婚的时候都要穿白纱？诸如板球运动，或者冥想、焚香等做法，是怎样流传开来的？等等。

目前，对于全球化传播的研究散布于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之中，其解释潜力有待进一步发掘。简单地说，存在着两种研究的取向，一种是从具体的背景因素、传播过程、变化形态等入手，讨论传播现象与其不同社会背景之间的互动；另一种是讨论传播过程中的机制性因素，解释变化得以发生的机制问题。

前一种取向的典型例子，是追溯幼儿园这种保育方式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的一个研究。在这本名为《幼儿园与文化：一种观念的全球化传播》（*Kindergartens and Culture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an Idea*）的著作中，编著者们梳理了 11 个国家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分别采纳了幼儿园作为其儿童教育体系之组成部分的案例，试图说明在

不同的政治设置之下幼儿园的功能，及其塑造民族、国家认同的作用。

幼儿园源起于 1840 年代的德意志，在 1848 年革命失败之后随着流亡者的脚步传播至美国与英国，并陆续以各有千秋的形式与澳大利亚、日本、中国、苏联、越南、波兰等国的社会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了一个综合了有关儿童保育与发展、教育学、心理学等方面的社会实践与思想的复杂的全球体系。

在不同的社会及文化背景之下，各国幼儿园的建立与发展又各有其特色。例如，美国与英国的幼儿园发展过程中中产阶级妇女的职业化是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并与社会福利制度的建立、杜威和蒙台梭利等的儿童发展理论结合了起来。而在日本、中国、苏联和越南等国，政府在幼儿园体制的建立、教育内容的设置等方面起着核心的作用，幼儿园本身也成为其民族认同、民族主义思想等得以形成的手段 (Wollons, 2000)。

后一种研究的取向，以《市场与民主的全球化传播》(*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为代表，以地区或全球范围内的特定的经济与政治措施或手段的传播为案例，分析了国际金融的自由化、缩减公共部门、私有化、双边投资协议、新自由主义税收政策等各个方面，研究其驱动机制。并指出民族间的好胜或竞赛、国家间竞

争等，是促进传播、逐渐形成新的政治经济体系的驱动因素（Simmons, Dobbin & Garrett, 2008）。

而相关的一篇论文，更是集中地将 20 世纪末的经济与政治的自由化趋势归结为国际间组织或专家共同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并总结了具体传播过程中的四个不同机制，社会建构的机制关注通行于国际组织间的某些公共规范；强制机制设定了强势的民族国家作为行动者，竞争机制表明了国家间的你争我抢的竞赛，学习机制指出，其他国家的经验会成为指导决策的依据（Dobbin, Simmons & Garrett, 2007）。

由以上举例可知，对于社会与文化交流、演变的研究，从早期的传播学派到现在的全球化传播的研究进路，其研究进路和关注点有所改变。一方面，研究者的关注点先是从复杂系统中提取相似元素，到现在以追溯单一物件的传播路线为主；另一方面，从对古代社会的推测，过渡到对当前世界的观察。更重要的是，传播论毋宁说具有明确目的论色彩，自身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其先定的文化中心、中心-边缘的格局等，已经设定了传播的结果；而现在的全球化传播，强调了传播过程中各个地区文化的不同的反应及其方式，其结果是未完成的、开放的。

与这两者相比较来看，侨易学所具有的一个独到之处，是包含着文化的主体性，即，探讨传播所及之处的文化系

统如何面对、吸纳变化，进而改变变化本身。这样，就使对文化交流的研究转变了立场，从传播者转向继受者，从描摹被动的冲击转为体现主动的因应。这样的进路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应当是具有包容性的、和谐的，其主体性既鲜明，又深谙因应之道——在稳定的认同之下有不断流变之实质。

具体到有关中国的反思与研究当中，建立在这样一个包容的、既稳定又开放的文化体前提之下，侨易学可以完成某种文化基因的“编码”的工作，即，能够追溯历史之变革，又深入地探究文化如何吸纳变革、维系其核心特征、发展出新的枝桠。这种区别名、实的分析方式，对于一般的文史研究来说，或许可改变失之呆板与专断的断代方法，进入文化体系内部的运行之中。例如，通过专门史对基本文化物件的条分缕析，可以建立起参差多态的历史编年体系由此，或许能更加接近错综复杂的社会历史本身。

一个显著的例子是晚清以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侨易学的立场，有助于建立一种更丰富的近代史与中华文化长期发展之间的有机联系，深入探究其演变的机制。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面对“近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受西方的冲击既大，在前述传播学派的影响之下，学术界深受“华夏文明西来说”之类的学说所困，可以说是撼动了数千年来文化体系的自足与自尊。彼时思想界的焦虑与彷徨，体现在近代史的叙

事主题与前提设定上，就是难以摆脱的冲击-被动反应、压迫-反抗等色调。应用侨易学的思想，或许在一定程度上将近代之变与历史上的重大文化变革联系起来，从而能够更从容地理解这一变局的影响与意义，理解中华文化吸纳、消化外来冲击的机制，从“不变之变”、“变中之不变”等角度深化文化的自觉。

总而言之，我认为，侨易学是一个富于想象力和发展潜力的研究方向。从知识史的角度来看，侨易学之概念的创生本身，体现出作者所具有的会通中西、勾连时空的气象。从学科发展的角度来看，侨易学能够凝聚不同研究领域的力量，致力于文化交流、演化、创新、承继等的研究。从中国自身的文化自觉的角度来看，侨易学有可能成为某种研究进路，深入揭示传统得以生生不息的机制。

参考文献：

王铭铭，2000《非我与我——王铭铭学术自选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Dobbin ,Frank, Beth Simmons & Geoffrey Garrett, 2007,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Public Policies: Social Construction, Coercion, Competition, or Learning?”,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33, pp. 449-472

Simmons,Beth A., Frank Dobbin&Geoffrey Garrett, 2008,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Markets and Democracy,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ollons, Roberta, 2000, *Kindergartens and Cultures: The
Global Diffusion of an Idea*.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